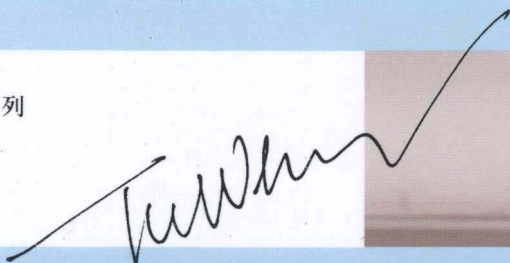


杜维明著作系列



# 现龙在田

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

杜维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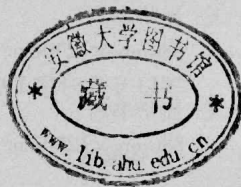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杜维明著作系列

# 现龙在田

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

杜维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杜维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杜维明著作系列)  
ISBN 978-7-301-22070-2

I. ①现… II. ①杜…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 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2517 号

**书 名:** 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

**著作责任者:** 杜维明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070-2/B·11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8.25 印张 插页 2 148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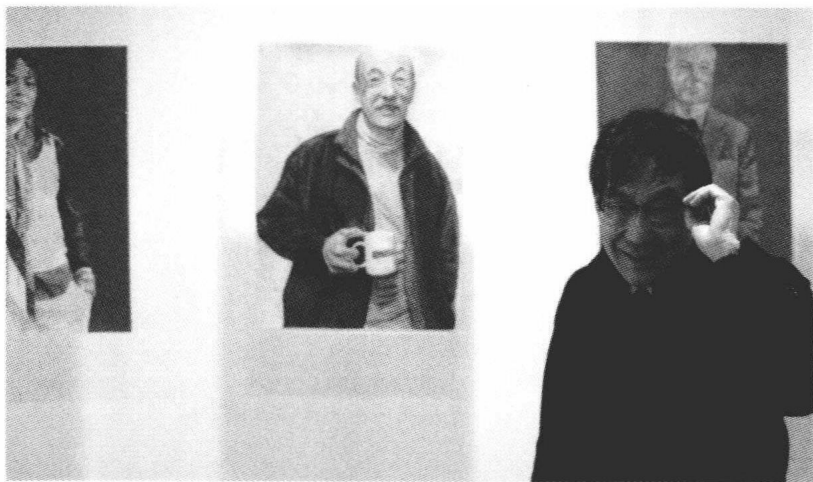
**定 价:** 33.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与傅高义教授的“合影”



80 年代和余英时在新加坡参加儒学伦理论坛



1985 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时的教师工作证

## 再版序

这本书所收的 31 篇曾以“西樵偶语”发表的散文和 4 次访谈记录,都是 1983—1985 年在哈佛任教时吐露的心声。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行时署名是《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贯穿着看似相对独立乃至毫无关系的短文的哲学思路是如何通过“习礼”来培养“体知”的能力。《论语》里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教诲。我的解读是,生活世界中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是学习做人的机缘。学问要在心上做也要在身上做。脑力运动固然重要,佛家所谓“常惺惺”则指向一个更宽广的意义世界。庄子所谓无处不是道和犹太一位长老要求学生当下体认“神圣”的教言可以互证。我正在写作,写作当然是神圣的,但是如果我正在系鞋带、刷牙、打扫卫生,那么那些行为也都是神圣的。在儒家论域中做出巨大贡献的 Herbert Fingarette 即把孔子定义为“以凡俗为神圣”的大哲。“礼”在儒家思想中是

属于“伦理”的范畴，但礼的字源虽来自宗教仪式，它的表现却有美学的含义。日本著名哲学家今道友信曾建议我从美学的观点诠释《论语》，特别是“乡党”一章。他说在学生的眼里孔子的视听言动都是艺术人生的化境。这样去看孔子才能知道他的人格魅力不在道德说教而在春风化雨，在身教而非言教。礼教常和乐教相提并论，儒家政治理想常用“礼乐教化”来表述这个道理。

在本书散文中我提到“百寿人瑞”萧老太、凯斯特波伯爵夫人和王尚义，也提到法国哲学家利科、俄罗斯汉学家陆彬和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贝拉，以及当代大儒熊十力、唐君毅和徐复观。我表示了对美国三校（普林斯顿、伯克利和哈佛）和我“共商旧学，共探新知”的研究生的感激之情。我在散文中触及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其他各种感觉。我也点到了儒学第三期发展必然面对的同时必须因应的挑战：女性主义、人权运动、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访谈中，我表达了一种信念。冯契所说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考验是，在迈进“新轴心文明”的阶段，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如何展现其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在文化中国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具有儒家特色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如何继续不断地发挥转世而不为世转的威信，乃至面向 21 世纪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 印度哲学家 Balasubramanian 语），如何通过文明对话，在容忍、承认、尊

重、互相参照、互相学习、庆幸差异的和谐心态中促进世界新秩序的重建。

1980年的初夏,我和陈荣捷老先生在意大利的科目湖(Lake Como)畅谈。他劝我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投入三年,用中文写一本以考据为基础的学术专书。然后每年发表论文两篇,五年出书一册。他说如此奋斗二十年,必然成为学问大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自况:如果他再有四十不惑之年选择学术路线的话,他不会为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用英文写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而会用中文写一本只有三五位哲学同道充分认可的讨论朱熹思想的专书——这才是学术成就。他坦率陈词,六十多年在美国传道授业解惑,发表了数百篇论文,演讲多达千次,但心灵深处并没有真正的满足感。最近到台湾,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和同行论学才真正感受到从事有知音回应的学术研究是多么幸运,多么愉悦。他的忠告对我的触动极大。我感谢他的爱护和关怀。我觉得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也有根深的忧虑。他所指点的道路是学术界的正途。我既已经走上了学术之旅,在世界顶级的学府任职,从事教研当然是我的本业。陈老先生的建议合情合理而且的确可行。

不过,我诚实地表示了不能接受他忠告的苦心。我的学术事业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乃至国际学坛,不只在宝岛。我必须绕道纽



约、巴黎、东京和汉城才能回家。我不能也不愿走法国汉学和乾嘉朴学的路，我的儒家之道随时随地激励我，使我不得不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辩难和对话。会议、演讲、面谈和访问是我以学习为精神磨练所不可或缺的功课。当然，我深知“笔耕凝道”是关键。如果不能用一笔一画形成文字，空口腾说的观点只不过是没血肉的见解，无法落实为确有意蕴的思想。不过，我坚信有历史意义的思想绝不是主观的臆度，也不是个人的私产。正相反，它必然能够感动一群人融汇成一股具有群体性和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在我的学思之旅中，1978年9月随美国海洋学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是头等大事。1957年我为了学习儒家而考进台湾的东海大学之后，特别是1962年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期间，我最期盼的是和大陆的知识人交流，亲身体究儒学在神州大地发展的前景。清晰记得，与友人魏斐德和向纳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信息披露的当晚因为确信前往北京论学的机会不远了而喝得酩酊大醉。不过，70年代初期，在艾思本人文中心当任职于可口可乐的友人代表公司提出优厚条件要求我走访香港和大陆时，我断然拒绝了。我没有观光，更不必说什么寻找商机的兴趣。但如果有任何可能性和中国的学术界接触则我会全力以赴。随海洋学代表团访华期间，对我而言最难忘的是在北京停留的那一个星期。我以

美国海洋学代表团成员身份在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市历史学会发表了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为题的大型演讲，向“文革”以后77和78两级大学生介绍韦伯关注经济文化中“价值取向”的分析方法。更难得的是当我告知团长由余英时率领的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正好也在北京活动的消息后，他便主动鼓励我全程参加他们的活动。由此我便成为包括张光直、Derk Bodde和Jack Dull在内的美国科学院汉代研究代表团的成员，和他们一起访问了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和马王堆研究小组。能够见到在中学便已读过的《文艺心理学》的作者朱光潜，感到非常荣幸。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张政烺先生在和马王堆研究小组的座谈会中宣称只向美国专家提供有科学价值的出土文献时，我立即要求先介绍一下没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否则就会与“五星占”和“导引图”之类珍贵文物失之交臂了。

1978年初次涉足青岛、北京、武汉、杭州，又重游曾上过小学的上海和广州，我深感必须回国学习，真实体验“中国文化”的现状，即使三五个月一补“旧学荒疏”的命运也是权宜之计。想起钢琴大家鲁宾斯坦，已届不惑之年声誉正隆之际，一位资深的音乐老师坦诚告诫：“你大可一帆风顺享誉全世界，不过如果你真想更上一层楼在历史上也占一席之地，那就必须彻底改变指法，从头起步。”经过了痛苦的挣扎，鲁宾斯坦决定从最基本的练习曲开始，

像小学生一样分秒必争地奋斗五年之久，才重新走上钢琴演奏的正途。我第一次聆听他的演出是在普林斯顿，那时他已逾八十。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奏家岂是偶然。1980年我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首批“资深学人交换计划”的奖助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向白寿彝、何兹全、刘家驹请益，上赵光贤为两位研究生开设的《尚书》导读，几乎每天都和77、78及79三级本科生少则一人多则十余人论学。1983年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汤用彤百年冥寿的学术会议并以内宾身份参加了在西安杨虎城故居举行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比较研究的座谈。那时与张岱年、冯契、王元化、李慎之、李泽厚、包遵信、朱维铮、庞朴、萧萐父、沈善洪、汤一介、乐黛云和余敦康都已成为忘年交或直谅多闻的益友。1985年我以富布赖特研究教授的名义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这是继梁漱溟1923年以来的第一次。那年，“文化书院”凝聚了一批包括梁漱溟、张岱年和冯友兰在内的学者开设传统文史哲的大型讲座。最难忘的一幕是参加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的“中华孔子学会”成立大会。我有幸和张申府、杜任之、冯友兰、任继愈、梁漱溟和张岱年等年逾八旬的长者，一起在开幕式发言，就好像和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代儒者同席论道。这使我想起，除了熊十力和马一浮之外，儒学复兴的大师大德，包

括张君劢、梁漱溟、贺麟、冯友兰、钱穆和方东美，我都有面对面亲聆教诲的体验。

在哈佛任教的头五年，因为已有深厚的“祖国经验”，我筹划教学、研究、行政和公共事务的问题意识便和普林斯顿以及伯克利时代大不相同。我关怀和研究的范围是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及海外华人在内的“文化中国”而不是狭隘的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政治中国。我所了解的儒家不只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包括越南、朝鲜、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儒家文化圈”或“The Confucian cultural area”。据说日本儒者岛田虔次“文革”期间曾在北大宣称，“如果贵国学者彻底扬弃儒家，我们京都的儒学研究员要加倍努力！”他是否如此说不得而知，但这种感慨一定会获得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全球海外华人的共鸣。一个难忘的印象是汉朝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后，我和 Derk Bodde 同车，他黯然神伤地说没有见到恩师冯友兰也好，否则怎么忍心问他为什么写出《论孔丘》这种书来！

我一再强调“建立自我的体上功夫”是有感而发的体之于身的真知。对一个扎根儒家身心性命之教而从事哲学工作的知识人来说，头等大事是建立自由独立的人格。我提出“体知”的哲学命题与其说是突然涌现的灵感还不如说是长年苦思默想所凝集而成的心得。Michael Polanyi 的“自我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和梅

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身体哲学对我有很有启发，但如果不是一再追问儒门的哲学反思为什么必须扣紧自我之类的课题而获得坚实的自知之明，外来的助缘未必即能受用。视听言动是身体的行为但又都是心灵的活动。我个人既因性向使然又因后天陶养对音乐有偏好尤其爱好弦乐四重奏。每次聆听《朱丽叶弦乐四重奏》和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如 Op. 131 便有美感经验之至的愉悦。不过观画，尤其是文人的山水画如倪瓒、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及道济也是我的至爱。参观美术馆，像台北的故宫，波士顿的 Fine Arts，纽约的大都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便是我在海外重温“中国艺术精神”的道场。可是应对、交谈、餐会、酒会以及各种祭奠也都是“习礼”的场域。如果把举手投足的肢体活动都融入哲学的反思，“做哲学”就不只是孤立绝缘摒弃一切独处斗室的脑力运动而已了。平时对外诱（钱财名利色欲）悉心检索，对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又不断调节，便会逐渐增加自我认识的能力和智慧。

从伯克利回到哈佛正逢不惑之年，但在我生命旅途中则是转变巨大的关头。从儒学研究的大方向看，我的确已经达到了“不动心”的境地。可是“身心性命之学”毕竟是“为己”而非“为人”。1982 年大手术之后至少有两个月不能轻易下床。我重读“四书”，发现几乎每个字都很生疏，连已经写成学术论文的观点也好像认

不得了,异化感极强。心灵深处只有默默自勉:重新学步慢行是唯一的选择。那时想起熊十力、唐君毅和徐复观的存在考验:如何在虚伪、卑鄙、无力、无理、无气的中华大地上播种儒门的善种?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并非高人一等的精英;没有政治权威,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社会资本。他们也知道只靠心中的悲愿是无济于事的。不过,他们的文化自觉虽然不来自上天所赐的灵感,也不来自个人的顿悟,却是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王阳明曾说过在和湛甘泉订交之前,一个人孤军奋斗传承孔孟之道,非常辛苦,几乎无法坚持下去,可是有了一位同心之友互相提携便觉信心大增无往而不利了。俄罗斯科学院的犹太学者陆彬(Vitali Rubin)是一位从未谋面的知音。他对我最大的鼓励是验证了陆象山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跨文化沟通。固然,这不是什么有客观基础的科学实证,但是当我发现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和意义世界里穷尽毕生之力研究儒家的理想人格,所采取的诠释道路与我竟如此相似,而所得到的结论竟又如此一致,一种“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愉悦不觉油然而生。

我决定把这本书献给狄百瑞。他是当今美国学术界东亚儒学研究的祭酒。在他出道之前,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如哈佛的费正清和耶鲁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已经非常重视儒家

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

传统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比如美国人文学界最有代表性的联合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就资助过五本专门讨论儒家的论文集。但多半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制度、理念和人物，几乎没有触及宋元明清时代塑造儒家论域的思想家的哲学或心灵世界。狄百瑞和陈荣捷密切合作，有系统、有策略地发展全面而深入的儒家思想研究。首先他把日本的冈田武彦，香港的唐君毅，和澳洲的柳存仁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组织明代思想研讨会。接着他召开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编纂传记，形成研究团队，培养博士后及博士生。经过半个世纪继续不断的努力，不仅宋元明清主要的儒学思想家，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大儒也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业已超过 90 岁的狄百瑞，至今笔耕不辍，还不放弃为本科生讲授儒家经典的权利和义务。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 21 世纪儒学复兴的典范人物。

2013 年 2 月 14 日

伯克利山庄

# 前 言

《三年的蓄艾》(志文出版社,1970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龙腾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编者注)宣泄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求学的情怀,《人文心灵的震荡》(时报书系,1976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编者注)吐露了20世纪70年代浅尝施教滋味的感触。这里所收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自觉地为儒学创造生机所作的反思。

其实,30多年前在建国中学读书的时期,就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有志于儒学探究;1957年考进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及徐复观两位老师一窥孔孟堂奥,也是为成全这意趣而作的存在抉择。可是,在北美求学任教的28年,虽然童心未泯,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很曲折。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联经,1989年)刊行之后,面



临海内外各种论说的挑战，笔者开发传统的精神资源，让儒家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的意愿更强，而且更迫切地感到重新认识和了解儒家是为“文化中国”创造崭新的价值领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事业。在这种心境里校读以“西樵偶语”为标签的30篇文章，便觉得每篇都只点题而已，都有重新起步“详为之说”，以阐明主旨的必要。但既然是副刊短篇，点题的笔法是难免的。在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谅解：设法从有限的文字去捕捉那多元多样但又坚守凝定的自我意识吧！

“儒学访谈”所收的四篇，因为是根据对话的实录，而且通过删节或摘要的形式见诸海峡两岸的报章杂志，应该算是“儒学论说”（Confucian discourse）的公产了。不过，必须申明，“访谈”是严肃的课题；即使空口腾说不必像笔耕那样句句皆辛苦，其困难度却常常超过书写文字，因为出口的声浪必须经过“入人耳”而且还能“心通”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信息。让自己珍爱的信息通过知音者的“听德”传播给广庭大众不仅要靠信念，也要有几分勇气。我希望读者正视“访谈”所提出的构想，充分利用这份公产并积极参与论说。